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基金资助

宗教学译丛 *Religious Studies Series*

关于上帝信仰的对话

Faith in the Living God: A Dialogue

[英] 约翰·波尔金霍恩 (John Polkinghorne)

[德] 米夏埃尔·韦尔克 (Michael Welker) / 著

刘光耀 / 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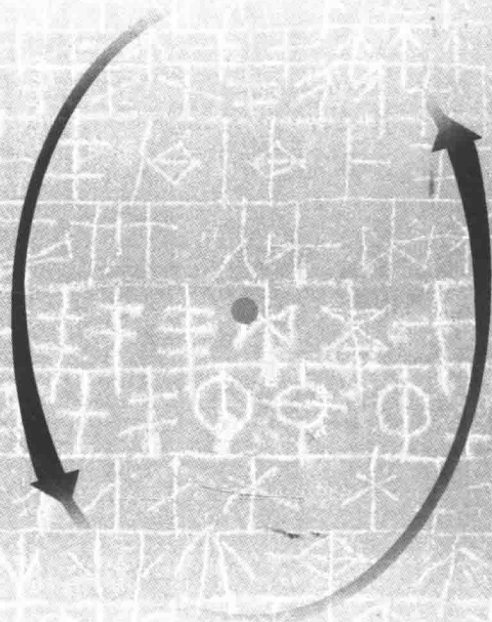
关于上帝信仰的对话

Faith in the Living God: A Dialogue

[英] 约翰·波尔金霍恩 (John Polkinghorne)

[德] 米夏埃尔·韦尔克 (Michael Welker) / 著

刘光耀 / 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关于上帝信仰的对话/[英] 波尔金霍恩,[德] 韦尔克著;刘光耀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宗教学译丛)

ISBN 7-300-06524-4

I. 关…

II. ①波…②韦…③刘…

III. 基督教-教义-研究

IV. B9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54569 号

宗教学译丛

关于上帝信仰的对话

[英] 约翰·波尔金霍恩 (John Polkinghorne)

著

[德] 米夏埃尔·韦尔克 (Michael Welker)

刘光耀 译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62511239 (出版部)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河北三河市新世纪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965×1270 毫米 1/16

版 次 2005 年 6 月第 1 版

印 张 12.5 插页 1

印 次 2005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168 000

定 价 20.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宗教学，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中国，近年来似乎正在成为“显学”。

在西方学术界，面对着伊斯兰教在世界上许多地区内的勃兴，穆斯林和清真寺在西方许多城市中的涌现；面对着佛教和印度教乃至某些中国宗教不单在亚洲继续存在，而且在西方扩大地盘的事实；面对着基督新教在中国和东亚、基督正教在俄国和东欧、基督公教和基督新教在亚非拉广大地区迅速复兴和发展的现状；面对着形形色色的新兴宗教在世界各地如雨后春笋、此消彼长的局面；面对着社会生活世俗化与宗教信仰多元化齐头并进的形势……学者们不得不投入更多的精力，去研究与宗教相关的问题，不得不尽力采用多学科的方法（包括社会学、心理学、历史学、经济学、文化学、人类学、现象学、哲学等学科的方法），去研究宗教及与之相关的各种现

象和关系，甚至不得不时时更新研究的方法、重新思考以往的结论。凡此种种，都使得宗教学不但在学生众多的大学课堂上经久不衰，在种类繁多的学术会议上热闹兴旺，在自成一类的学术出版中日益发达，而且在从上帝存在的证明这样古老的传统哲学问题，到新兴宗教的作用这样紧迫的当代社会问题上，在从精神生活的趋势这样普遍的社会人生问题，到宗教对话的基础这样现实的文明共处问题上，都继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重大作用。因此之故，宗教学在西方，以 130 岁的高龄（就宗教科学言），甚至 2 500 岁的高龄（就宗教哲学言），而呈现出蓬勃生长的态势。

在中国学术界，自从 20 世纪 80 年代初以来，各宗教的迅速复苏和发展，对学者们的工作提出了纷繁多样、层出不穷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提出了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同步发展以适应宗教形势和社会形势的现实要求。而研究宗教的学者们尽管来自不同的领域，尽管面临缺少资料、缺少资金、缺少语言训练、缺少社会理解等等困难，仍然依靠自发自愿的、艰苦卓绝的努力，继承了前辈们中断 30 年的宗教学术事业，使中国宗教学在短短 20 余年间，获得了琳琅满目的丰富成果，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巨大进展。现在，对于宗教学研究的迫切性、重要性，社会各界已有了越来越多的理解，一些政府机构和宗教团体，已经越来越重视宗教学的研究，不少社会科学院和高等院校，也越来越关心和支持这门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的发展。这种情况，作为中国宗教学界众多学者 20 年努力的可喜结果，不但是中国学术全面发展之福，也是中国社会健康发展之福。

然而，我们也必须看到，中国的宗教学发展还面临一些具体而重大的困难。除了需要社会上下各界的进一步理解和思想解放，以便进一步消除研究禁区和填补研究空白之外，曾经夭折而新生不过 20 余年，因而同发达国家相比还很弱小的中国宗教学最需要的，一是培养人才，二是积累资料。在前一方面，现在已有一些高校设立了宗教学系，更多的高校设立了名称各异、侧重不同的研究所或研究中心。尽管这些机构在培养人才方面，总体上说还存在“倒金字塔”（即研究生多于本科

生)或类似现象,但毕竟已在开始扭转人才缺少的困境。在后一方面,现在国内在资料的翻译引进方面依然十分零散,在发达国家宗教学百花齐放、分支细密、大师辈出、名作如林的情况下,我们可以找到的资料更如一鳞半爪,少得可怜。这不但使研究者难以站在前人的肩膀上扩大视野,难以从前人的成果中吸取自己成长所需的养分,大大拖了现有研究工作的后腿,而且使有关专业的老师和学生难以得到教学所需的资料,难以了解基本的(更不必说最新的)学术进展情况,直接拖了人才培养工作的后腿。

有鉴于此,我们不怕能力薄弱,组织创设这套译丛,希望得到学术界、教育界新老朋友、耆儒新秀们的参与和支持,一起来开始扭转中国宗教学资料缺少的困境,一起来为中国宗教学的人才培养做一些资料积累的工作。在初创阶段,为了适应我国宗教学需求的特点和我国宗教发展的特点,拟设立宗教学研究(包括描述性研究、规范性研究和对话性研究)、佛教研究和基督教研究三大系列;为了适应学术研究、教学参考和广大读者层次不同的需要,拟采取概论专著和经典名著兼收并容的方针。

我相信,零散的力量若能相对集中,累积的效果必将十分可观。我还相信,很多朋友都有推进学术、造福社会的美好愿望,让我们共勉,把这愿望变成行动吧!

何光沪

2003年10月31日
于中国人民大学宜园

『真理问题是神学中
至高无上的原则』

这本书的作者之一约翰·波尔金霍恩是位理论物理学家，英国皇家学会（Royal Society）会员，剑桥大学女王学会（Queen's College）前任主席，利物浦大教堂正典神学家（a Canon Theologian of Liverpool Cathedral），英帝国二级爵士（KBE）。他1930年出生于英格兰，1956年任丁爱堡大学数学物理学讲师，1968年任剑桥大学教授，1984年被肯特大学（University of Kent）授予物理学名誉教授。他在许多知名专业刊物上发表过多篇专业论文，出版过《解析S矩阵》（*The Analytic S-Matrix*）、《高能过程模式》（*Models of High Energy Processes*）等一系列著作，在科学领域享有盛名。然而，读者想像不到的是，1979年，即在其被遴选为英国皇家学会会员后的第五年，波尔金霍恩辞去了在大学中的教职，专门去接受做一位教会神职人员的训

练，两年后被按立为执事（Deacon），1984—1986 年成为靠近坎特伯雷（Ceaterbury）的布林（Blean）市的教区牧师，且于 1986 年成为剑桥大学三一学院（Trinity Hall）的牧师。

由于在科学和宗教两方面都拥有优异的造诣和学养，波尔金霍恩出版了《世界存在的方式》（*The Way the World Is*）、《一个世界，科学与创造》（*One World, Science and Creation*）、《科学与上帝》（*Science and Providence*）等一系列著作，致力于推动科学与宗教间的对话。由于其贡献卓著，2002 年被授予邓普敦宗教促进奖（Templeton Prize）。

本书的另一位作者米夏埃尔·韦尔克则是德国海德堡大学神学院系统神学教授，海德堡国际学术论坛（Internationals Wissenschaftsforum Heideberg）主任。他 1947 年出生于爱尔兰根（Erlangen），少年时代在西柏林度过，15 岁时移居改革宗的大本营巴拉丁（palatinate）。韦尔克先后在海德堡和图宾根大学研读神学，1973 年在当代神学大师莫尔特曼（J. Moltmann）的指导下完成神学博士学位，并担任莫氏的助理讲师。1977 年韦尔克在美国研究怀特海（A. N. Whitehead）及其过程神学，翌年在海德堡大学获哲学博士学位。1980 年他在图宾根大学完成系统神学教授资格论文。

与波尔金霍恩不同，比波氏小 17 岁的韦尔克没有第二次世界大战那样的战争经历，迄今为止他的生活主要在大学里度过。1983—1987 年间，他在图宾根大学任系统神学教授，1987—1991 年间则在闵斯特大学（University of Munster）任改革宗神学讲座教授，并同时曾在美国芝加哥大学、加拿大迈克麦斯特大学及美国普林斯顿神学院等校担任客座教授。1991 年，韦尔克成为海德堡大学系统神学教授。

与波尔金霍恩相同的是，韦尔克也致力于宗教与科学以及其他学科的对话。1996 年起，他担任海德堡大学国际学术论坛主任，推动过许多跨国界、跨学科的学术对话与研究计划，曾受邀在普林斯顿神学院、圣彼得堡、汉城、哈佛大学神学院、耶鲁大学神学院、芝加哥大学、爱丁堡大学主持学术讲座，并曾在北京主持过讲座。除了繁忙的讲学活动之外，韦尔克同时还担任了许多学术期刊和系列丛书的编委，并出版了

30余本专论书籍，发表了200余篇学术论文。与波尔金霍恩还有一个重要的相同点是，韦尔克在教会中也有授职：邦法尔兹福音教会的授职神学家。

十分明显，由这样两位在出身、教育背景、职业、所属教会等方面都既相同又不同的学者来共同谈论基督宗教信仰问题，无疑是非常富于激发性的。但两人都极为尊崇《圣经》，极为推重教会信仰传统，并且都是“批判与自我批判的实在论者”（Critical and Self-Critical Realism），即都以实在论立场批判相关的宗教及学术言述，并且甚至还更为严苛地反省和检审自己的信仰，对自己的神学思考提出更高的批判性要求，这是两人的“对话”最令人钦佩和最富魅力之处。因为恰如本书作者所言：“真理问题是神学中至高无上的原则”，而真理则关联着实在。

一、存在：关于创造主的两种图像

波尔金霍恩心中的写作对象是“对探究基督宗教信仰的合理性问题持开放态度的探索者”^①，“尤其是对特别看重科学见解的探索者或者怀疑科学与神学之间存有天然对立的人”。他因此而采用了他所谓“自下而上”的思想方法，即从对自然世界的思考，逐步迈向对信仰的思考与肯定。波尔金霍恩指出，对许多科学家来说，“信仰”、“上帝”、“创造主”都可能会成为将其绊倒的绊脚石。在他们看来，所谓信仰即意味着相信实际上不可信之物，“他们会很轻易地认为信仰就是要他们在理智上自杀。对科学家来说，像中世纪的安瑟尔谟（Anselm）所谓信仰可以与为了理解而进行的研究联系起来那样的想法，往往不过是种稀奇古怪的观念”；信仰可依靠的不过是“非理性的断言”，即所谓无法求证的“启示”。

在波尔金霍恩看来，没有什么误解比这更大了。因为整个护教学所致力即从理性上为信仰的合法性作出辩护，即“表

^① 译者前言凡引用作者在本书中的论述，概不注明出处。——译者注（本书所有脚注均为译者注）

达宗教信仰理性根源的真正尝试”。“像《尼西亚信经》(Nicene Creed)那样简洁扼要的陈述看起来的确具有那种绝对断言的样子。但是,高能物理学家在他们的口袋中所携带的粒子数据表也同样如此。双方都是由经验和解释之间复杂的互动要素所提炼出来的精华。”两者的差别仅在于,科学的经验即实验,基督徒的经验除其个人的信仰经验之外,还有整个信仰传统的基础事件:道成肉身、十字架被钉、耶稣死后三天复活、五旬节圣灵降临等。如果说科学可以以这些事件的惟一性和给定性而拒绝承认其真实性的话,那么,科学自身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宇宙这个科学的研究对象也是给定的,“宇宙学则只有一个宇宙去研究”。

“科学家可能被绊倒的第二个词是‘上帝’。”因其以为基督教的上帝是位魔法师般的上帝,常“以突发奇想的方式修改”和干预宇宙自然进程,并像一个“喜欢恶作剧的精灵”,人类生活中一些悲剧性事件即由此而来。波尔金霍恩指出,这样的上帝形象与基督教信仰所刻画的上帝的上帝其实相差甚远,它实在是科学家的误判。因基督教的上帝是信实的,他作为“自然法则的授予者不会对它们反复无常地随意干涉”。至于《圣经》中对上帝所做的像魔法师般的描绘,当属于“历史的沉淀物和属于文化的特殊性及局限性的东西”,也正是释经学和神正论锲而不舍地力求解答的问题,这种指责其实并无根据。

科学家“最后的绊脚石是‘创造主’一词本身”。因依霍金(S. Hawking)著名而天真的说法,“如果宇宙没有可具体测定的开始时间……那么,就没有什么事情留给上帝去做”。波尔金霍恩对此尖锐地指出:创造的教义并非时间的开端问题,而是一个存在论问题,即“为什么毕竟世界存在而不是不存在”的问题。因此,即使宇宙没有或目前人们还没有找到它可具体测定的时间,关于为什么世界毕竟在而不是不在的问题,从而关于创造主的教义问题就仍旧是有意义和有效的。因世界毕竟存在,人的理性有权对此进行询问,而“创造主”即对此询问的解答中的一种。

由此,波尔金霍恩非常鲜明地使我们看到,“信仰的实质乃是对实在的认同与回应”。当安瑟尔谟说信仰寻求理解时,

“它所涉及的即对实在之性质的探索”，因正像科学是对其所相信之实在的回应一样，神学寻求理解的信仰亦然。各种学科皆为通向实在的窗户，神学亦众多窗户中之一窗。对“人类经验与探索的一切形式，都要将其作为通向实在的窗户系列……”但波尔金霍恩明显意识到，对那些有“科学头脑”的读者而言，当这么说时，立刻会有这样的问题随之而生：科学是“价值中立”的，但信仰能中立吗？科学所认识的对象是显然可见地存在着的，但信仰的对象难道也如此吗？若不然，难道能说信仰也像科学那样是实在的回应吗？

显然，在此波尔金霍恩无法寥寥数语便证明上帝的存在，但这并不意味着无法证明信仰同样是对实在的回应。一方面，同科学一样，信仰辩护或由信仰所生发出来的理解所遵循的也都是同样的理性的法则。若科学对理性之运用是对实在的回应，则宗教亦然。宗教诚然不是价值中立的，但科学中同样有价值的参与，“在实际工作着的科学家团体中，价值认同仍扮演着重要角色”。这也就是说：价值也参与着对实在的认识，作为价值表现形态之一的信仰便也同样是对实在的回应，其他价值形态如道德、艺术等也如此。波尔金霍恩反问道：若谓道德与实在无关，若说惟一之实在只是科学的实在，那么，“我们道德直觉的性质是什么？关于虐待儿童是错误的说法难道是为了实现物种进化的功效而采取的某种暧昧不明的策略吗？也许迫使他们像奴隶一样干活效果会更好些”？波尔金霍恩的意思是：倘若自然科学的功效或自然世界自身的要求并不是支撑道德及艺术的基础，而道德、艺术以及信仰又确实需要有一个基础的话，那么，此一基础便只能是实在。因为，如果没有实在作为根基，那么，或此或彼的道德选择标准便会最终丧失掉任何选择的意义：“实在是价值的承载者”，“科学和宗教都是认识和回应事物的实际情形的方式”。科学、宗教、道德、艺术等，均系人们由以观看实在的不同的窗户。虽然每扇窗户都有其固有的局限，“也没有不将它自己的视角强加于观察者身上的窗户”，但“减少观察错误的惟一方式是利用一切可能利用的多种视角的观点”。

波尔金霍恩指出，井然有序的宇宙秩序、宇宙在理性上的

关于上帝信仰的对话

透明性、任何极其微小的误差都可能使宇宙荒芜不育的那种令人惊叹的奇妙，尤其是人类意识的出现等，都令人感受到对宇宙的有神论理解更为可取。虽然不能绝对肯定有神论是对的，但要绝对否定它也同样是站不住的。

韦尔克作为一个批判的实在论者，完全赞同“当信仰寻求理解时……它与实在的性质相关联”。但作为一个自我批判的实在论者，韦尔克则毫不忌讳地质疑他的对话伙伴：有“对上帝的自然意识”吗？在韦尔克看来，信仰上帝与认识自然有着一个根本性的不同：后者基本上只是一种对于对象的静观，而“对创造主上帝的信仰是一种活生生的和信赖的关系，它关系着塑形、判断和拯救的力量，关系着使自然、文化、历史以及所有这一切即我们的生活保持为一个整体的人格性意志，还关系着指引受造性的存在和生命并给予其意义、方向和命运的人性内容”。信仰并不与知识相对立，但它首先超越了知识。因“上帝不仅只是一位‘综合一切的主体’，而且是充满爱、公义、审判和拯救的力量、意志，是人性的因素”。上帝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他“给予人的生命以方向、重量、尊严，这是一个固定的‘终极点’（ultimate point），一种自然规律所不能提供的最高观念或原则”。信仰创造主上帝一方面植根于个人内心的生命呼求，另一方面也植根于历史地形成的信仰传统，植根于信仰传统的基础事件。

由此出发，韦尔克没有“信仰中立”地从哲学的或一般理性思考的角度将创造主问题看作一个本体论问题，而更多的从《圣经》、从信仰传统的语境中来展开其言述。这使韦尔克得以独辟蹊径地指出：“‘圣经实在论’不仅在所谓‘创造描述’上，而且能够在上帝创造的整个领域中看到上帝的创造性行动。上帝连接着宇宙力量和生物学力量，连接着自然权力和文化权力。最后，上帝以要人治理植物（创^①2）和动物国（创1）的命令而将人纳为他自身的一部分。”韦尔克强调说，“《圣经》文本并不孤立地将自然宇宙作为‘受造’来谈论”，“创造不仅是自然的产生，而且是文化的产生”。韦尔克特别指出了

① 即《创世记》，本书所引《圣经》中的各篇篇名均用篇名称表示。

《创世记》1章和《出埃及记》24章以下，即创世的六天和安息日与上帝在云彩的暗处创造圣殿模型的六天及召摩西向他晓谕的第七天之间在结构上的平行，指出在上帝的创造中，自然、文化、信仰崇拜是三位一体的，把握这种受造的三一性，而不是仅仅从自然的理性沉思着手，才是理解创造主上帝的恰当途径，后者往往会沦为神学简化主义（theological reductionism），将上帝简化为抽象概念，使人失去同创造主活生生的联系。

对韦尔克的看法波尔金霍恩是赞同的。但也许是出于他的科学家读者的需要，波氏对韦尔克的上述说法回应道：“在据称是受造的自然中，如果没有神圣的迹象可被看到，那将实在是令人奇怪的；但如果受造的自然世界便是关于上帝的全部故事，则也是件怪事。”

二、信仰：信仰传统中所生发的个人生命决断

波尔金霍恩认为，自然神论虽有其致命的软肋，“通向实在的窗户”虽然不能自发地引向对上帝的信仰，但它却能够自然完成从理性的形而上语言向信仰的人格语言的过渡与转移，能帮助神学家完成从“哲学家的上帝”到亚伯拉罕的上帝、以撒和雅各的上帝的合情合理的转移。譬如，合乎情理地，“认为宇宙和人类最终没有意义导致进而大胆断言：上帝还将被发现是这样一位上帝，他是人类获得超越死亡这一命运的希望之基础”。也就是说，“窗户”比喻的极限是窗户比喻的碎裂，由之而出现的是人们同耶稣基督活生生的相遇。

那么，这种相遇是如何发生的？

它发生在个人人格同耶稣基督身上所体现出来的上帝的超人格的互动，而这种互动又只能发生在历史性的信仰团体、信仰传统之中。易言之，它发生在信仰团体所传承的信仰传统的背景下个人同耶稣基督的相遇，体现为在这种相遇中的个人生命的决断。

对于一个杰出的科学家的头脑来说，尤其对于一个以科学家和信奉科学的人为主要读者的神学家来说，若对信仰的发生

作出这种解释，他立刻想到的问题自然而然地便是：信仰的发生要以置身于信仰传统、以对信仰团体经验的某种认同为前提，岂非一种解释上的循环？如此解释岂是合乎理性规则、岂是科学的？科学岂容外在先入之见的闯入来横加干预？

波尔金霍恩对此答道：“当我们从一个选定的解释性的视角开始考察物质世界之际，科学本身便开始了，而自然的历史也便结束了……在科学中，理论和科学实验与科学家本已拥有的东西之间的纠缠是必不可免的。在科学和神学领域，解释与经验纠结成解释学循环：理解的获得要求有一个原初信仰的可待修正的认同，信仰则得到它所提供的理解的支持。”波氏的意思十分明白：像信仰的某种先行认同一样，科学也离不开同样的先行认同——这是任何理解行为的“先理解”。

理解了这种先理解，个人的信仰决断为什么必须以对信仰传统的介入、以对信仰团体的某种意义上的参与为前提，便可得到恰切理解了。对耶稣基督的信仰由耶稣基督的复活而来，而这一复活则非凭空而来，它出自基督徒们的生命见证：“复活信仰不是一种无根基的断言，绝非独立于任何历史证据的参与之外。”也就是说，“基督信仰不仅仅与个人的信念、决定和行动相关。个人信念、决定和行动这一点的重要性是必须承认的。但还有一个集体的维度，这在保罗关于基督身体的教义（罗12：1；林前12；弗4）中极清晰地表达了出来”。波尔金霍恩有句非常精辟的话：“人性是关系性的。”信仰作为人的信仰自然也是人性的表现，这种人性与其他的人性一样，如果没有对他人生活或他人人性的参与，其形成是难以想像的。因此，波尔金霍恩下面的话同样是精辟的：“新教强调的个人宗教回应需要与天主教和东正教强调的对传统的尊重以及在接受新的神学见解时对整个教会的判断的尊重之间保持一种平衡。”

当然，信仰作为个人的生命决断，个体的意义与地位在这里绝不可低估。“如果人类出现在宇宙历史中是一个具有极大意义的事件这一想法是对的，那么，个人范畴在我们对实在的理解中便是一个可期望具有同等重要性的范畴了。”不仅如此，波尔金霍恩更强调指出：耶稣基督便是带着极为鲜明的个人特性与人相遇的，这个个人特性即其“如此令人不解的‘具有特

殊性的耻辱’ (scandal of particularity)”。耶稣基督的特殊耻辱即其羞辱乃至耻辱地在十字架上的被钉。但这一惊世骇俗的耻辱也同时表明了“神圣性质和神圣意志的实现已被最为明确地集中在单个人身上的可能性肯定是值得考察的”。这使得拒绝耶稣基督的特殊耻辱无疑将贬低个人的意义。

当然，个人决断与信仰集体之间、信仰的发生与对信仰传统的先行认同之间以及耶稣这个“人”与其作为救主即作为“神”之间、其作为神的荣耀与其特殊的耻辱之间无疑存有某种紧张，这种双方之间的互相渗透与同时并置之间的游移互动，无疑也会成为科学家或“科学目光”所质疑的一个焦点。波尔金霍恩以量子物理学对波粒二象性现象的发现令人信服地对此作出了回应——作为一个为科学家写作的神学家和科学家来说，他怎么会不知道他的那些科学家伙伴儿会想些什么呢——“《新约》作者们被迫同时使用富有人性和神性的语言准确地描述耶稣”与波粒二象的理论语言在理性上属同一种范式。诚然，“关于这样一种令人惊愕的思想的和谐性与可理解性存在着许多困难”，它需要神学家诚实而努力地面对，但这岂能成为武断地否定信仰的理由？类似的情形在科学史上并不乏见，更何况“神学比物理学要困难得多”！

对于波尔金霍恩的论述，韦尔克所强调的仍是哲学言述的局限性与《圣经》文本和圣经传统的重要性。“仅仅试图在一种哲学范围或一种时代思潮的范围内把握信仰内容会出现问题和令人不满。但《圣经》的正典传统包括了一千多年的灵性经验”，虽然这些经验并非铁板一块，但耶稣基督也依然“真实临在” (real preaence) 于其中，临在于信仰团体对耶稣基督的种种崇拜之中，虽然他也许并不“亲自临在” (personal presence) 于其中。

由于对耶稣基督的信仰起于对耶稣复活的确信，韦尔克首先强调，基督信仰乃“作为复活信仰的基督信仰”。由对复活的信仰，“复活和被高举的基督的临在就成了宣告中的临在、圣事庆典中的临在、《圣经》解经中的临在、效法基督中的和在他的荣耀中的临在……以与对创造主的信仰占据着整个人类实存的同样的方式，对复活的上帝的信仰也包括了我们的全部

关于上帝信仰的对话

实存”。

对人的生存而言，复活事关重大。韦尔克强调说，“通过其临在以及通过其工作，复活的基督更新了人类与上帝的关系，同时也更新了人与人之间的生命之关系”。这更新的人神关系即上帝与人的和好，更新了的人人关系则为在基督之中的人与人的和好。韦尔克以其丰盛的属灵的生命向人们点出：复活事件对于人是从来未曾遇到过的、陌生的事件，以至于“在向第一批见证者的显现中启示自己的复活的基督，似乎是‘没有门徒’（without his followers）的”，因为耶稣的门徒们在开始之际都没有认出他，没有想到被钉十字架的主竟会复活了又站在他们面前。指出这一点是极其意味深长的。无人马上认出耶稣的复活，一方面表明了这是一种全新的人神关系的开始，另一方面则表明了对耶稣之复活的认信受到了人类千百年来已固定下来的“智慧”和认识的阻碍——人死不能复活，对复活的耶稣基督的认信则必须超越这些确定性及认识，须“懂得内在的个人确定性和共同确定性的局限，懂得一定会被一再超越的这种确定性的局限”。这样，对复活的信仰既是“某种确定性和某种认识，同时又是对确定性和认识局限性的认识”。波尔金霍恩对韦尔克的这一思想甚为赞赏，在对韦尔克的评论当中，他特意引述了韦尔克下面的话：“只有在信仰当中，只有在确定性一次又一次地被打破并陷于危险当中，只有在认识一次又一次地被打破并陷于危险当中……我们才能与这位复活者联系起来。”

韦尔克指出，正是由于复活信仰超越了既有的认识，使人固有的确定观念得以被打破，人们对于复活前的耶稣有了新的理解，在新的理解中对复活的信仰亦得以更加坚固。韦尔克说：“随着复活，对复活前的耶稣的‘回忆’产生了。这种回忆并非仅是一种重新收集，它还是受到复活的显现以及复活前耶稣的活动与宣告深刻影响的一种经验和期望。我把这一回忆叫作‘正典回忆’……正是正典回忆塑形了与耶稣基督‘在信仰中’的关系。”

三、圣灵浇灌的创造性差异：警惕抽象的圣灵全在观

波尔金霍恩明确写道，在对三位一体的上帝的信仰中，也许从理性上把握圣灵最为不易，因“隐藏是圣灵的本质性特征”。如果说创造主圣父有着君王般庄严的形象，圣子耶稣基督有着被钉十字架的形象，圣灵的形象则只是纯洁的鸽子。或者“依照西方教会的观点，圣父的形象是在圣子中被表明的，但圣灵在这个时代则仅仅是由陪伴着圣洁信徒的进行创造性的最后工作的灵魂的形象（pneumatic image）所隐秘地表明的”。圣灵的难以把握甚至使得在圣灵一词的翻译上也令人踌躇再三，拿不准将之译成“灵魂”（spirit）还是“圣灵”（Spirit）。将《创世记》第一章第二节所说的运行在混沌水面上的“上帝的灵”，理解为“吹过原始深渊的‘上帝的风’”也许并非毫无道理。《圣经》中也不乏圣灵像风一般难以把握的记述。而且，“圣灵的隐藏性与许多信徒的经验也是一致的”。因为依《圣经》著名的说法，信徒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腓 2：12-13）。圣灵的恩典在人的自由意志中行动，人常常难以觉察。然而，圣灵的隐藏性绝不意味着圣灵完全不可捉摸。波尔金霍恩表明：圣灵作为一个超越人格而又具有人格的位格，是以同人人格性互动的方式而行动的，因此人可通由圣灵的行动而认识圣灵。

对此，波尔金霍恩说：“圣灵将以适当的方式参与全人类的生存，但我们可以预见这种参与发生的方式在各人那里各有不同，而且在那些相信基督之名的人和不相信的人之间描绘这种参与的方式也不相同。”这也就是说，圣灵是无所不在的或全在的。这使波尔金霍恩得出了一个十分令人注目的结论：一方面，“真理的圣灵将不仅仅在宗教团体内起作用，而且还在一切追求真理的团体之内起作用……这一点当然包括科学家团体”；另一方面，在各种与基督教文化和基督教信仰不同的文化与信仰当中，都有基督教所谓同“神圣之维相遇的某种形式的证明”，都有圣灵的行动踪迹与果实，基督教可将之“视为匿名圣灵的隐藏的果实（hidden fruits of the unnamed Spirit）”。波